鉴古知今

——评《清代的边疆开发》

孙 喆　王 江

马汝珩、成崇德两位教授主编的《清代的边疆开发》一书，最近由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式推出。

《清代的边疆开发》是国家七五重点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参与此书撰写的都是在清史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他们用了多年时间，经过反复论证、修改，终成完稿。该书的出版，对推动中国边疆史研究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版图辽阔，民族众多，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复杂多样，在历史上，其间虽然几经分裂割据，但国家的统一、各民族间的逐渐融合是我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至清代前期，我国统一民族国家又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不仅政治上达到空前统一，各民族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更加紧密，而且边疆地区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基本上奠定了我国幅员辽阔的疆域。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与我们今天相去不远，因此，研究清代边疆开发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鉴古可以知今，它可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了解边疆地区的现实，更正确地制定边疆发展方针。

清代的边疆地区，与我们今天所指，略有差别。具体来说，有东北地区，包括辽、吉、黑三省；北部地区，指内外蒙古；西北地区，主要指新疆；西南地区，指云南、广西；西部地区，指西藏和青海、四川的藏族地区。除上述陆疆之外，还有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岛屿，形成广阔的海疆。这些边疆地区，由于自然环境、气候条件、交通状况、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上有很大的差异，在开发的形式、规模、清廷的政策及开发所取得的成效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特点。《清代的边疆开发》一改以往多以研究论文、研究心得汇集成书的情况，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描绘出一幅清代边疆开发的全图。它以篇的形式，将清代的边疆开发分为新疆篇、东北篇、蒙古篇、西藏篇、滇桂篇、台湾海南篇六部分，各篇体系一例，但又自成格局，各篇在全书中无地位轻重之分，论述皆系统、详尽，将特定历史时期内不同边疆地区开发的异同清晰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满族作为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中国长达268年之久，与其“齐其政不易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的统治政策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清廷针对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明智地采取了不同的统治方针。表现在边疆开发上，如书中所言，在清前期，清廷对各边疆地区的开发政策差别是相当大的。如新疆地区，自十八世纪中叶，清朝将之彻底纳入版图以后，对该地区一直采取鼓励“移民实边”之策，由乾隆帝钦定成书的《西域图志》概括地表达了清廷开发新疆的指导思想：“准噶尔四部及诸回部，旷处荒陲，故其山川形势，崇岗迭嶂，险足以守，长河广泽，深足以堑，指顾二万里中，扫荡廓清，归我皇化，包戈偃伯以来，非建置无以善后，然地大物博，惟是戍代往来之孔亟，即善后者又将何以为继。我皇上圣谟广远，集大勋于五载之中，即为策永定于亿万斯年之后……凡皆以西域治西域，而经费不取支于中土。”在这一思想背景下，清廷对前往新疆的移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资助。对台湾、海南、滇桂等边疆地区的移民开发活动，清廷是采取有限度的禁止政策，而在东北和蒙古地区，则实行严格的封禁政策。因此，上述地区的开发，是以不受官方资助的自发性移民开发活动为主的。清廷实行不同政策的原因、方式及效果，在各篇中均有详细论述。各边疆地区移入人口的来源、数量、素质、边疆开发的程度等等，都有很大差别。如蒙古地区，开发的结果是在原来的游牧区域内形成了一片与内地接壤的农业区和半农半牧区，游牧经济虽有所衰弱，但在整个清代，仍在该地区占有优势地位。东北和新疆地区，经过前期的有限开发及晚清“新政”的大规模放垦，清末均已建省。西南滇桂地区，经过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在清前期已开发得相当彻底。通过分篇的形式，我们对清朝在各地区边疆开发活动中的成败得失一览无余，对我们今天因地制宜地制定政策大有借鉴作用。

各篇在自成一体的同时，对清代边疆开发中的共

性问题也进行了探讨。清朝之所以能取得前所未有的开发成绩，与它稳定的边疆政局是分不开的。东北地区的开发，是在十七世纪东北军民有效抗击沙俄南进的侵略势头及《中俄尼布楚条约》等法律文书签定的基础上进行的。居住在今天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中原农耕民族和农耕经济的严重威胁力量，清朝的建立彻底改变了这一事实。长期以来的相互敌对、和战相间的局面得到了改善。乾隆帝在上谕中曾说："古北口一带，往代皆号岩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今乌鲁木齐、辟展各处，知屯政方兴，客民已源源前往贸易，茆担土锉，各成聚落，将来阡陌日增，树艺日广，则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污莱辟而就食多，于国家牧民本图大有裨益"。台湾的开发活动也是在康熙年间统一台湾以后才快速进行的。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清初曾沿袭从前的土司制，土司世代相袭，具有浓厚的割据性质，甚至俨然独立王国，严重阻碍了同内地的接触。针对这些弊病，雍正朝开始大规模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制，设立府州县衙门，委任流官进行统治。通过种种举措，将西南纳入自己有效管辖之下。综合各篇的分析，可得出一个一致的结论，即正是由于清朝大一统版图的奠定，才使得历史上长期处于分散、孤立和彼此隔绝——边疆各少数民族之间的隔绝和中原与边疆各地区之间的隔绝状态，从根本上得到了扭转。全国各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整体联系，客观上刺激了内地民人向这些地区迁移的积极性。只有在形成了政治上的稳定局面之后，才能有开发活动的顺利进行。

清朝与我们今天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人口过剩问题。各篇对人口压力与边疆开发的关系均有论述。清初，由于清廷颁布了一系列恢复生产、安定民心的政策，人口开始逐渐回升，至乾隆四十四年(1779)，人口总数超过两亿，乾隆五十九年（1794)，人口总数超过三亿。如此高的人口数额是在传统农业的条件下取得的，既没有机械化，也没有规模经济，人地矛盾自然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早在康熙年间，康熙帝就指出："自平定以来，人民渐增，开垦无遗。或砂石堆积，难于耕种者，亦间有之，而山谷崎岖之地，已无弃土，尽皆耕种矣。由此观之，民之生齿实繁"。在故土无法生存的农民开始把目光转向人口稀少的边疆地区。正如乾隆帝所言："我国家承天眷佑，百余年来，太平天下，化泽涵濡，休养生息，承平日久，版籍益增，天下户口之数，视昔多至十余倍，以一人耕种而供十数人之食，盖藏已不能如前充裕。且民户既日益繁多，则庐舍所占田土不啻倍蓰，生之者寡，食之者众，于闾阎生计诚有关系……犹幸朕临御以来，辟土开疆，幅员日廓，小民皆得开垦边外土地，以暂谋口食"。这种做法，对解决当前人口问题依然有可取之处，直到今天，我国人口分布的格局还是内地地少人稠，边疆地广人稀。当然今天的边疆开发并不是简单的人口迁移过程，其必须以经济内涵式的开发为前提条件。

二

参加《清代的边疆开发》一书写作的六位作者，都是在清史研究领域，尤其是在边疆史研究方面长期辛勤耕耘，颇有成就的专家。该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绝不空谈理论，而是将观点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所用资料包括清朝档案、文集、地方志、《实录》以及国外文献等，并且引用了很多蒙文和藏文的一手材料，经过严密的考证和分析，对一些重要学术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弥补了边疆史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西藏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与内地联系较少，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保持着相对多的独立性。以往对西藏开发问题的研究，由于资料方面的限制，成果不多。该书"西藏篇"的作者，由于对藏文曾进行过一段时间的钻研，在搜集和运用材料上占有很大的优势。其对清廷开发西藏的策略、西藏的行政体制、经济结构、宗教传统对开发的影响等方面作了详细的论述。使我们认识到，清朝的开发活动自始至终都包含着对西藏的考虑。作者精辟地对清廷治藏的成败得失作了总结。指出清前期治藏政策最大的成就在于其政治上积极而稳妥，最明显的缺憾则在于其在经济开发上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清末新政对西藏地区的开发虽给西藏社会注入了一股清新气息，但它并没有启动西藏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成为激发西藏社会产生突破性变化的诱引和动力。这与西藏的地理环境、社会发育程度、蕴含于民众中的宗教观、商品经济观及清廷投入的开发资金等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移入边疆地区的内地人口大部分从事农业，而农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商业、手工业、矿业及城镇的发展，这些行业共同促进着边疆地区的繁荣发展及内地化的进程。《清代的边疆政策》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来论述边疆地区各业发展情况，叙述生动、详实，为我们展现出一幅开发边疆的五彩绚丽的图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个疆域广大的国家，不仅有辽阔的陆疆，而且有远比陆疆更为广阔的海疆，以往人们多注重陆疆问题而疏于海疆研究。《清代的边疆开发》一书弥补了这一空白，对清代的海疆，特别是台湾、海南岛的开发历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尤以对海南的研究着墨较多，对今天海南的开发颇有镜鉴作用。

另外，对于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对边疆地区的领土割占、经济掠夺，及随之发生的西方资本主义

的生产力、科学技术、思想意识在边疆的传播，近代工矿业与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等新兴事物的出现，边疆地区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抵御外侮，努力发展本地经济文化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书中都给予了充分的论述，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边疆史研究内容。

《清代的边疆开发》另一重要特色是将清朝的边疆开发活动与同一时期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边疆拓展开发活动进行了横向比较，突破了长期以来边疆史纵向比较研究的传统，使我们对清朝边疆开发的成败得失有了一个更为客观的认识。书中指出，“边疆开发并非是中国特有的历史现象。在几乎与清代中国边疆开发的同一历史时期，美国有对其西部地区的开发，俄国有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开发；在本世纪，日本有著名的北海道开发，巴西也对其富饶而贫困的西北部进行了大规模的开发。美国西部开发在各国边疆开发中最引人注目，是人所共认的较成功的边疆开发活动。”通过对当时中美两国边疆开发的历史背景、两国边疆的地理环境、边疆开发的物质条件、政府的开发政策、社会传统意识等方面的比较研究，书中得出结论，正是由于以上种种因素的不同，美国西部的开发活动，使得美国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子系统呈现出一种精微的统一和自然的整合，使这种社会结构下的人们的生产、经营能动性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从而使美国西部开发得以急骤进行并使美国西部实现了经济上的起飞。而在清代，我国封建社会已处于发展缓慢、徘徊的历史时期，这种趋势决定了中国边疆开发难以取得突破性成效。虽然边疆开发促进了清代边疆地区落后经济面貌的改变，但这种开发多属于内地社会、经济和文化模式在边疆地区的复植，不具备蕴育新的社会形态的条件。书中同时也指出，“对中国边疆开发和美国西部开发进行比较研究并不是贬此褒彼，而是为了从两者的特征与其共性中寻找出一些对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的客观解释。”这种客观、负责的态度贯穿全书，使得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三

《清代的边疆开发》共计四十余万字，是近年来同类学术著作中部头较大的一部。全书的论述全面而不失重点，文字朴实流畅，在研究方法上，讲求从当时具体历史条件出发，客观评价历史活动，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以为现实服务为要旨，确实可称得上是一部成功之著。但是，该书也有一些缺憾之处，我们认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我国的少数民族多聚居在边疆地区，边疆开发自然不可缺少少数民族的活动，他们与汉族一样，对边疆的巩固、发展和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清代的边疆开发》对此有一定篇幅的论述，但仍嫌不足。人口的流动是清代边疆开发得以进行的重要因素，同内地人口不断处于流动状态一样，由于战争、游牧等原因，边疆各民族的居住地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他们的生产、生活形态以及宗教信仰对移入地也必然产生深刻的影响，可能囿于资料等方面的限制，该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还不是很清楚和深入。

2. 清代的边疆开发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边疆内地化的过程，民族的融合和冲突交织在一起，一种经济形态让位于另一种经济形态，一种文化受到另一种文化的冲击，必然要经历抗拒、反复、逐渐适应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清代的边疆开发》对这一问题从总体上作了阐述，但缺乏个案研究。

3. 在对海疆开发论述上，台湾着墨不多，有失衡之感。

以上几点，仅是笔者陋见。所谓瑕不掩瑜，《清代的边疆开发》确是一部深具启发性、现实意义重大、极见研究功力的著作，凡有志研究清代边疆史之人，不妨一读。

（作者孙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邮编 100872；王江：中国人民大学外事处，邮编 100872）